

“没有城管”，可供探索的选项

□ 冯海宁



时事评论

4年前,河北省元氏县曾因为一起城管和民众的对抗,导致城管大队被撤销,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没有城管了!”元氏县城的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街上一片繁荣,叫卖声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没有城管的状况仅持续了7个月,新组建的城管大队便挂牌了……(7月27日《华商报》)

最近几个月,城管的负面新闻一直活跃在公众视线。“城管打死瓜农”、“城管围殴”等事件一次次冲击人们的眼球。多起暴力事件,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城管”何去何从,既需要各方积极讨论,也需

要多种探索。

《华商报》的报道从多个角度解读了“城管”:一是河北省元氏县4年前因一起事件撤销了城管大队,结果大街上一片繁荣,小县城再现“清明上河图”的场景。二是西安一个没有城管的蔬菜早市,摊位井然有序。这都是在没有城管的情况下出现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场景,无疑是许多人所向往,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繁华的街道,既让摊贩实现了自我就业、自我保障,又方便了居民购物、生活;既是商业繁荣的折射,也是安居乐业的反映。可以说,无论是提振内需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需要“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场景。

或许有人会说,“清明上河图”的场景,会影响城市交通,破坏城市形象。但笔者以为,这并非不可调

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如何设计和创新。比如,一个城市应该多一些像西安这样没有城管的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保障基本的市场秩序。另外,也可通过协会管理、摊贩自治等实现有序经营。

河北元氏县取消城管之后带来的是繁荣景象,后来悄悄恢复城管似乎也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从元氏县的情况来看,有城管和没有城管的县城面貌,差异不大。而且,摊贩向城管缴费就有了“合法”手续,摊贩不缴费只能偷偷摸摸摆摊。这似乎说明城管存在的价值主要是收费,但收费却无法可依。显然,这样的城管并无多少存在的必要。

现在,很多城市不仅不反思城管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还在不断为城管“扩权”,这让人忧虑。其实,城

市管理完全可以多角度探索:一种是治标式探索,如“眼神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另一种是治本式探索。比如,建议制定相应法律来明确城管的定位、权限等。但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城市的矛盾,不可能依靠一个城管部门来化解,而是要从城市规划、交通执法、环境保护等角度分别化解。如果城市规划画出专门的市场让摊贩解决生计问题,如果交警部门负责道路交通,环卫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能,工商部门有效管理市场,没有城管完全可行。

虽然元氏县当时取消城管是无奈之举,但这一举动却让人看到没有城管后的商业繁荣与权利自由。而西安设立一个没有城管的蔬菜早市,则是城市治理的有益探索。笔者希望,城市在探索解决城管标与本问题的时候,“没有城管”也是可供探索的选项。

迟来的“抱歉”依然让人感动

□ 刘 鹏

近日,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致书《快乐老人报》,就自己文革期间,批判一位叫张琼英的老师而致歉。希望“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起”,“张老师已经快90岁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之后,道歉信得到了被道歉的张琼英子女的温情回复:“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疚了。”(7月27日《潇湘晨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都会有需要向别人说声“抱歉”的时候。例如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比如无意中做错事使别人蒙受了损失,再比如有意做某事甚至违法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甚至某个集体和单位的个人行为,对其它集体和单位、其他人带来不可挽回损失等。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面子情结、因为利益之争,或者仅仅只是因为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很多人不愿意说这声“抱歉”,以致使很多事情由小变大,由良化恶。比如多看了一眼而打群架,比如踩了别人脚没道歉而引起群殴事件等等。可以说,我们中的很多人,确实缺少一种勇于认错、敢于道歉的精神和勇气。这也是退休教师温庆福45年后的一句“抱歉”而引起我们关注和反思、感动与敬佩之处。

台湾实体书店存活经验值得借鉴

□ 涵 今

7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东门的野草书店老板含泪宣布,他和老伴儿苦撑了3年之后,“现在连一块钱都拿不出来”,只能清仓关门。南京的书店也正在遭遇差不多的“困局”——它们正逐渐被一道由网络围剿和高成本构建的高墙所包围。(7月28日《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为了扶持实体书店,近期有关方面正在研究针对实体书店财税方面的扶持政策,未来实体书店的税费有望减免。减免税收,对实体书店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能否救了实体书店,恐也难说。归根到底,实体书店的出路还在自身。

由此想到,我国台湾同行的成功经验能否为我们所借鉴呢?台湾有以性别为主题的书店,有融咖啡馆、书店、寿司店于一体的书店……其中一家书店“有河book”,位于淡水河边喧闹的观光区,以闹中取静成为特色,还被资深书评人傅月庵赞为“台湾风景最美的书店”。该店除了售卖图书之外,还定期举办影展、诗歌交流会,从而吸引了不少爱好者,他们即使不买书,也会来店跟老板聊聊电影,跟老板娘聊聊诗歌。

对比之下,台湾独立书店的经营之道,很值得大陆同行参考,尤其是那些生存艰难的实体书店。实体书店经营不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实体书店只要肯动脑筋,不是一点前途都没有的。

“毛中模式”把“狼爸”集团化

□ 梁江涛

一所大别山脚下小镇上的中学——毛坦厂中学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2013年高考考生11222人,一本达线2503人,占22.3%,9312人过本科线,达线率82.3%……连续4年都保持如此水准;今年招46个复读班总计近8000人。毛坦厂中学被网友封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以管理严格著称,被学生称为“地狱”,但生源仍源源不断。(7月28日《燕赵都市报》)

在这个存放家长、考生希望与梦想的地方,教室座位密得弯不下腰;“收起个性,跟着老师干”;“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班主任管着“上厕所和睡觉”,比军事化管理还要严格;“这里是通往天堂的地狱”……如果说“将三个子女打进北大”和“把两个儿子打进清华大学”的狼爸只是另类家长的个人行为,那么,以“高考机器”著称的“毛中模式”就是“狼爸”的集团化。正是这个集团化“狼爸”,把高考彻头彻尾地异化为流水线式的产业。

早些年,人们议论应试教育模式,说孩子们苦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到了今天,已经有了“升级版”。近年来,从“高考吊瓶班”到“学生集体烧书”;从“给孩子服避孕药避例假”到“启东市汇龙中学一名中学生众目睽睽之下讨伐教育体制”,再到学生把高考复习班比作“地狱”,

足见高考大棒的挥舞越发起劲,升学率竞争呈现白热化趋势。可以这么说,“状元榜”就是学校的“终极荣誉”,班级升学率是老师的“车间利润”,而每一个考生的成绩都是家长最大的“政绩工程”。

“狼爸”集团化把高考拖入产业化的迷途,受到了家长的青睐。比如毛中最高学费达4.8万元;学生复读平均提升分数近100分,原来只够上专科的也能跃升一本,因此有大量陪读家长。“毛中模式”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为了让考生安心学习,当地政府关停镇上的几乎所有娱乐场所,这里找不到网吧、KTV、桌球室,在所有重要路口都安装监控,防止学生乱跑。固然,这对校园安全是有好处的,但从另一侧面折射了当地官员教育政绩的扭曲和对应试教育的坚定支持。

现在,各地其实都有“毛中模式”。高考产业化泯灭孩子的个性,误导家长,拖累社会,违背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以高考成绩论英雄,只能培养“读书机器”,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但要改变这一切,不是“毛中”们所能做到的,推行素质教育,必须将教育改革引入深水区,通过均衡教育资源,配套改革高考与高等教育制度、人才评价制度,才能起到“源头活水”之效。

漫画

作者/薛一



7月25日晚,信阳交警在例行查酒驾,在对牌号为豫SA7098小轿车进行检测时。该车下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边推交警一边把驾驶员往回拉,并不停地喊:“谁敢查我的车?谁敢查我?我是处级领导!”(7月28日人民网)

“太嚣张了,处级干部就能那么嚣张吗?”

昨日,说起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位信阳市民非常生气。记者了解到,车牌号为豫SA7098的小轿车是信阳市体育局的公车,该中年男子为该局的副局长姚世斌。对此事,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